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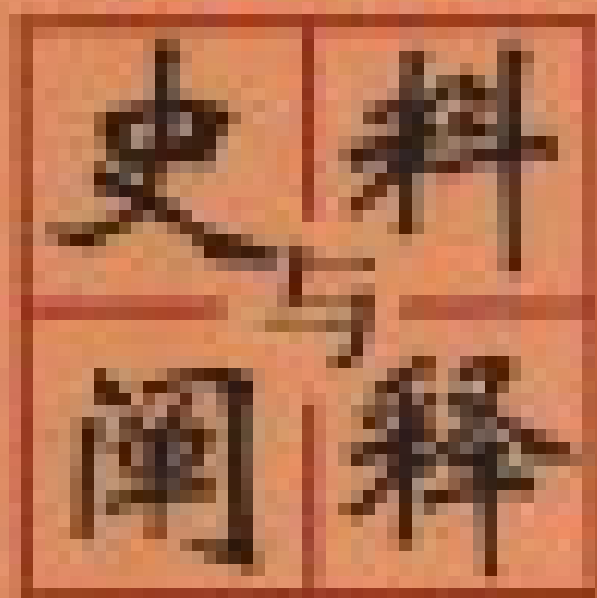
卷貳壹零貳

本刊合

史料
与
阐释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985 工程”三期院系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104

Supported by Shanghai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Project Number: B104

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贰卷合刊本)

主 编: 陈思和 王德威
执行副主编: 张业松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贰卷合刊本/陈思和,王德威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
ISBN 978-7-309-10059-4

I. 史… II. ①陈…②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史料②当代文学-文学史-史料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8850 号

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贰卷合刊本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7.25 字数 630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059-4/I · 799

定价:7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头语

本卷(2012 卷)仍是以合订本的形式出版的。先前计划中我们准备每年出版两期刊物,每期三十万字左右。但由于出版时间延期使大量稿件挤压,同时也因为有些专辑的文献整理、目录汇编以及相关论述的篇幅都比较大,三十万字很难给予刊载,经与出版社商量,决定以合订本的形式出版。于是 2011 年卷和 2012 年卷的篇幅都达到七十万字左右,内容也相对比较厚实。

我们觉得这样的阅读效果可能更要好些。在目前图书市场上以轻薄、玲珑、娱乐、流行为时尚风气的小清新时代,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以厚重形式来承载一些时代的另类信息。所以,从 2013 年卷开始,本刊不再采取合订本的形式,改以年份为卷数,每年编辑出版一本,七十万字左右,即在 2014 年上半年开始编辑 2013 年卷,9 月交稿,进入出版流程,年底出版。

本卷的主打,是以晚清文学研究为主题,着重推出段怀清、刘小源两位研究者新发现并且翻译的一组辜鸿铭书信文献及相关论述,许俊雅教授在多年来孜孜不倦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研究中对于王韬、林琴南等文人作品在台湾流布的重大发现,袁进对上海近代文学的研究,以及韩国学者李宝暻关于“晚清一五四”文学中优生学主题的研究。此外,关于老舍、赵清阁、徐志摩的三个专辑也是早已经约来的弥足珍贵的稿件,承蒙解志熙、傅光明、段怀清三位研究者的大力支持以及耐心等待,直到现在才给以付印,这是我们要表示歉意,并且真心致谢的。希望以后的稿件不至于再延期付型。

论述部分中,秋石先生的《试论诬胡秋原为“托匪”的由来始末》一文,针对上世纪 30 年代的一桩公案,即左翼文艺理论家发起的围攻批判“自由人”胡秋原,又牵扯出对“第三种人”苏汶、“小资产阶级作家”杨邨人的批判。虽然这个批判运动被当时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及时出面阻止,但由于当时的中共领导所推行的仍然是“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这个事件实质上并未得到真正的纠正,以致于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以及相关学术研究中,始终把左联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作为正面的事件去宣扬,对于批判中受到伤害的胡秋原、苏汶、杨邨人等人也缺乏客观的评价,甚至连 2005 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依然对受害者作了不公正的介绍。秋石先生从 2004 年去台湾访问晚年的胡秋原先生开始,立志要还胡秋原历史的公道,他经过七八年

的努力探索,多次著文,呼吁为胡秋原先生的历史冤案澄清真相。本刊发表的这篇长达六万多字的论文中,作者对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领导人受到的“左”的路线影响,对于胡秋原的不公正批判,尤其是污蔑胡秋原为“托匪”的事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反思,清算了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王观泉先生的《〈资本论〉在中国》更是一篇震撼人心的好文章,他把梳理《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及其影响与中国特色的农民革命战争对照写来,把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西方搬来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指挥下历尽失败、又如何在战争实践中发现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继续革命的教训……都作为历史大背景,写尽了《资本论》在中国的曲折浮沉的命运。王观泉先生是著名的党史研究专家和鲁迅、陈独秀、瞿秋白研究专家,八十多岁高龄,并且有严重眼疾,但我们读他的火山爆发一般热烈的文字,就会相信,他的学术生命依然是满溢着青春和活力的。

目 录

【文献】

辜鸿铭专辑

- 辜鸿铭致骆克哈特书札十通并二附录 刘小源 译 段怀清 校注(3)
辜鸿铭致骆克哈特书札十通并二附录(英文原文) 辜鸿铭(13)
英租时期威海卫档案中的辜鸿铭书信 刘小源(23)
辜鸿铭与清末民初的公共言论空间 段怀清(31)
——以与骆克哈特及《字林西报》之关系为中心

老舍专辑

- 老舍抗战期间及40年代后期佚文 老舍 著 解志熙 辑校(51)
“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 解志熙(67)
——老舍抗战及40年代佚文校读札记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最后回归 孙洁(80)
——《正红旗下》的写作意义

赵清阁专辑

- 赵清阁致韩秀信(十七通) 韩秀 辑注(89)
赵清阁致韩秀信(五通,外五通) 韩秀 辑注(100)
一信一世界 傅光明(107)
——赵清阁先生的晚景晚境

徐志摩专辑

- 徐志摩致中华书局函 段怀清 辑校(116)

【论述】

- 王韬文言小说在台湾的转载及改写 许俊雅(126)
——以《台湾日日新报》为例
林纾及其作品在台湾考辨 许俊雅(160)

试论上海近代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意义	袁 进(180)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优生学	[韩]李宝暲(215)
——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为中心	
再读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命题“救救孩子”	[韩]李宝暲(226)
——以优生学的计划解读	
试论诬胡秋原为“托匪”的由来始末	秋 石(234)
《资本论》在中国	王观泉(274)
读《管锥编》《谈艺录》札记	高恒文(291)
邓台梅与越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越南]裴氏翠芳(302)

【资料】

《试论诬胡秋原为“托匪”由来始末》参考资料	秋 石 辑注(312)
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本目录	[越南]裴氏翠芳(323)
(作家作品单行本)	
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目录	[越南]裴氏翠芳(340)
《京报副刊》综述	陈 捷(347)
《京报副刊》总目分类汇编	陈 捷(358)

【回应】

张晓风致许俊雅信	(426)
许俊雅致本刊信	(428)

文献



编者按：

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官场士林中最早具有现代公共舆论意识并坚决予以实践的言论家之一,是最早利用其“精于西文西语”“遂于西学西政”之独特优势,以当时士大夫阶级中并不多见的世界眼光和时代意识,与西方世界进行跨文化对话,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政治历史体制、解释中西政治军事外交中的矛盾冲突、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同时以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物质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军国主义乃至殖民侵略主义等等进行全面批判并真正享有国际声誉的批评家之一。辜鸿铭的公共言论中所开辟的中西文化比较论、文化统合论,以及他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价值及独特性的言论立场,与晚清以来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并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改良、革命等时代价值主题形成了既矛盾冲突又具有一定互补同构性质的复杂关系,共同汇成了清末民初浩浩荡荡、形形色色的思想言论之时代洪流。

但是,作为一个公共舆论的积极实践者,辜鸿铭却又坚决反对晚清洋务派、维新改良派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广开言路、开设报馆的变法主张,并以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及文明的“堕落”与“歧途”,与西方现代教育、现代报馆、现代民主、现代宗教等之间相互生成的关系论证,来为他的反西方化及反现代化言论立场辩护。由此而呈现出来的文化批判立场及累积而成的公共批判言论,推动并形成了晚清中国第一波具有世界眼光、时代意识并达到世界水准及相应影响力的反现代化批判浪潮。

辜鸿铭生前大量文论是用西文西语完成的,这些文论不仅见之于在华西文报刊,而且还有不少散见于西方多国的报刊(包括日本),其文论集在西方世界编辑出版者亦不少;此外他还精心翻译完成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和《大学》,这些儒家经典的全新译本及相关阐释,进一步扩展甚至推动了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认识和相应研究。遗憾的是,因为辜鸿铭的上述文论散见于各种外文外国报刊,尤其是辜鸿铭的书札等文献资料,在搜集、翻译、整理上还存在不少具体困难——辜鸿铭作为公共言论者的一生之中,多通过信札方式,与西方在华报刊编辑联络,同时与英、德、法、美、日等国公共知识分子亦多有书札往还。但这些信札,鲜见流传。目前即便较为完整的辜鸿铭文集中,在辜鸿铭文章的搜集、翻译和整理上依然存在不少缺失。

本专辑在由刘小源根据山东威海档案馆查阅抄录到的辜鸿铭致英属威海卫行政长官骆克哈特书札十通、汪凤瀛撰写的《辜鸿铭先生六十岁寿序》、《字林西报》编辑欧文·葛林回复骆克哈特书札一封的基础之上,先将这些书札翻译成中文(刘小源译),并对这些书札中所包含的内容信息进行了关联性的解读分析,完成了两篇相关研究论文,希望能对辜鸿铭研究有一点具体贡献。

另,辜鸿铭信札手稿原文中有个别地方字迹难以辨识,整理时已在相关处标明。《辜鸿铭与清末民初的公共言论空间》一文中所征引的辜鸿铭等书札,其译文并非直接摘录于刘小源之译文,特此说明。

刘小源 译 段怀清 校注

辜鸿铭致骆克哈特书札十通并二附录

一、1910/03/04

1910年3月4日 上海,卡特路70号

尊敬的詹姆斯·骆克哈特先生:

要是您知道了我在上海过着怎样一种糟糕透顶的生活,相信您一定会原谅我在春节前接连收到您的多封来信之后却未曾以表谢忱的无礼了。不过,我已经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寄给了您,希望您会喜欢。感谢您上封来信中对我获授进士的称赞^①,这适逢我的书出版问世。其实,由于那篇关于端方(Tuan fang)的文章,我差点陷入大麻烦。上海道台向南京的两江总督、设在苏州的江苏巡抚、端方个人以及外务部告发了我。南京的两江总督对我颇为友善,他对上海道台的回复如下:文字狱非盛朝所应有之事。换言之,一个好的政府不会因为一个人说了什么而去惩罚他,而是看他到底做了什么。苏州的江苏巡抚是满人,且曾与我在黄浦浚治局共过事。他私下里跟我说,尽管端方为其近亲,但从政治角度,他同意我对于端方的评论。因此,他对上海道台的告发也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外务部决定给我记大过一次,以示对我的训诫。我的老友兼同僚梁敦彦(Liang Tun yen),现为外务大臣,他通过私人秘书告诫我,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保护我,以后我要再谨慎小心,他不会再给我庇护了!这是一个老朋友的话么?!我真想写信告诉他,我不需要他的什么庇护。不过考虑再三之后,我没有写这封信。南京的两江总督是站在我这边的,他退还了外务部对我的处分决定,并拒绝给我记大过。

总的来说我还是幸运的。此文发表后九天,端方就下台了。要是端方还没有下台,我的处境会颇为尴尬。不过,听北京的消息说,摄政王在决定开除端方前,看过我的文章的译文。您看,这就像古书上所说的,“诸事都顺风顺水”的了。

我来上海已四年了,外面仍危机四伏,不过我已经克服了“内部”危机,剩下的外部危机并非那么难以应对。我们设在这里的办公室也就还能维持一年的光景,除非政府向黄浦浚治项目再投资几百万。不过我倒也挺乐意离开上海。问题是我离开这里之后到何处安身?我在这的收入可观,但是房子却贵得离谱。而我还得帮助我的兄弟和侄儿们,我的一个兄弟年事已高,不幸的是他现在又卧床不起。而我到了这个年纪,也感到比年轻时候更加需要物质上的一些满足享受。我自己有保险,所以万一有什么状况,我的

^① 1910年1月,清廷以“游学专门”一等赏授辜鸿铭文科进士,位第二,列严复之后。

儿子“阿斯卡尼俄斯”(Ascanius^①,中文名辜守庸)可以有所保障。我的最大焦虑也就这样解决了。我刚把“阿斯卡尼俄斯”送到青岛一所德国人开办的高中读书,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个上海这里的人所说的德国人。

对了,您和您家人们现在怎样了?我想您应该是有几个子女的父亲了吧。毫无疑问他们也都已长大成人了吧!您婚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我在上海没几个外国朋友。两年前,我的一位教友去了威海卫照顾她生病的丈夫。她曾去拜访过威海卫督署,后来告诉我,您说我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是啊,如果我多食一点人间烟火,现在应该过得更好一些吧。无论如何,要是现在没有了衣食之类的后顾之忧,我就会闲坐篱园之内,专心于著述,去撼动那些欧洲人。如今这个已经破败不堪的帝国,曾经拥有过多么伟大的文明啊!在我看来,这些文明永远不会衰亡的,永远不会!即便是不能餐餐吃上黄油面包,喝点稀饭米汤,也能修身养性、保持和平的心态啊。

您现在该知道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好作者了吧。我写不了像银行支票那样的短笺,至少给朋友们写信时如此。要写,我就一定是敞开心扉来写。恐怕有些朋友会说我的心扉敞开得太长久了吧。希望您不作如是观。不过我这里还是得收笔了。

我现在寄给您的是一份备忘录的印刷版,这是两年前在都察院里提交的。在备忘录里您还会读到一些大臣的报告。我确信您的中文一直没有荒废,而且您也一定能够轻松阅读这份备忘录。贵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一位朋友把备忘录翻译成了英文,但译文实在令人难以卒读。或许您可牛刀小试地翻译一下。

随寄的还有我抨击端方的那份言辞激烈的文稿。此文您读起来恐有些难度。我怀疑有多少外国人能全部读懂这些诗句,并真真切切地理解它们的内涵。布兰德(J. O. P. Bland)^②先生在他最近一本书中说中国没有诗歌。最后,我寄一本《约翰·吉尔宾》^③给您,您可能没有读过。

最后,非常感谢您的盛情邀请,也许有朝一日我的办公室关门了,就会投奔到您那里去。

最良好的祝愿,您真挚的

辜鸿铭

二、1910/09/21

1910年9月21日,上海,卡特路70号

尊敬的詹姆斯·洛克哈特先生:

我寄给您的这部两卷本的著述,书名为《张文襄幕府纪闻》。这部书是匿名出版的,但了解作者的那些人,一看都会知道作者是谁。我曾一度想对我的那些同胞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士绅们大声疾呼。我的一些中国友人对我说,这本书能让我更容易混碗饭吃。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您是否能理解书中的一些文学历史典故。在我看来,恐怕没

①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拉丁史诗《伊尼特》中主人公埃涅阿斯(Aeneas)之子,意大利阿尔巴隆迦(Albalonga)城的创建者。

② 布兰德(1863—1945):《泰晤士报》记者,与人合著《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书,另著有《李鸿章传》等。

③ 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为18世纪英国诗人考珀(William Cowper)的一首叙事长诗。辜鸿铭将其翻译为《痴汉骑马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多少人能真正理解。

近来,我对这里一份报纸上有关诋毁威海卫辖区的一起案件的报道颇感兴趣。这个诽谤错得非常离谱。我的一位颇为年轻的友人——他乃安徽一世家子弟,极不明智地接任了《神州报》这一言论立场偏激的报纸编辑。对于这起诽谤案件,《神州报》的解释是,其报道是从青岛一家报纸上转载来的。当这起案件起诉到法院,也就由法院来一手裁定被告该如何弥补其过错。后来英国法官请英国皇家律师代拟道歉书,而这份道歉书谦卑下作,奴性十足,我的这位朋友来找我时声泪俱下,说他宁可投河自尽也不愿自己直面这种道歉书。我写信给一个苏格兰朋友,并把这份道歉书寄给他看,他也认同我的观点,认为任何一个有自我尊严的人,都不会同意接受这种道歉书。他建议我去找你们这里的法官伯恩(Bourne)先生,说他深谙君子之道。我见到了伯恩先生,问他:要求一个无意做错事的人以这种方式去道歉,弄得自己颜面尽失,这是否正确合理。最初伯恩先生说,对于发表这种诋毁威海卫的文章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可丢失之颜面。我说,既然如此,那你就直接将其关进监狱,而不是还要他道什么歉。道歉是一种可贵的行为,而不是用来玷辱赔罪人的。况且在这个事件中,这位朋友也是情有可原,其发表刊登之内容,是从青岛一家报纸上转载来的。后来伯恩先生让我给他看一下这份由皇家律师起草的道歉书。看完之后,他同意了我的看法,即没理由要求这种方式的道歉书。伯恩先生接着让我另拟一封致歉书,并说会向当局有关部门反映这个事情。我把草拟的致歉书寄给了他,他回信说将说服皇家律师接受我拟定的这封致歉书。

但是,当这个案子到最后开庭之时,致歉书的内容又被修改了,而且被告在致歉外,还被判罚款。案子也就这样结案了。而我想说的是,在这起案件整个过程中,你们英国当局表现出来一种令人非常遗憾的怀恨、报复心理。诚然,中国的编辑由于自己愚蠢过激的行为而给贵方造成了很大伤害,我也绝非那种拒绝对他们的上述行为予以适当惩罚之人。但是,物不平则鸣,您也必须得承认,当今中国有许多不平之事。而对于那些当权之人来说,在应对那些公共言论中甚至显得过激的言语之时,亦当保持最公正和人道之精神,而不是像贵国当局在这一案子中所表现的那样强硬报复心理,此乃逆耳良言。

我知道写信告诉您这些,是冒着与您争吵的风险甚至失去我们之间友谊的危险的。不过,如果因此而放弃了自己对于这一公众问题发表看法的自由,而且不能如实与您就此展开讨论,我想这表明,无论是您对我的友情,还是我对您的情谊,都是不堪一击的。

乞请原谅如此搅扰,亦请相信我之所言。

您诚挚的,

辜鸿铭

三、1911/09/01

1911年9月1日,《字林西报》暨《北华捷报》,上海。

尊敬的詹姆斯·洛克哈特先生:

在与商务经理讨论过您的来信之后,过去三周我一直欣喜难抑,以致未能即刻给您回信。乞谅。

非常遗憾地告诉您,对于这种类型的著作以书的形式再版,他并不抱太大希望。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远东地区,想以这种方式让作家和出版商都从中获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个更大的读者群。至于文章,可首先发表于《字林西报》,之后您可自由重

新发表于国内其他报刊。不过目前还不是最佳发表时机,虽然革命已平息。但接下来肯定还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可能会占去我们报纸的不少版面,而您的译文内容也一定很长。不过您最好还是把文章打印出来寄给我,鉴于这个内容听起来确实很有趣,我也很乐于拜读。

不过,我还是有一点建议。在这件事上,辜鸿铭本人的权利何在呢?对他的意见尚未作清楚了解就发表这样一篇译文是否可以?如您所知,虽说他和《字林西报》关系一向不错,但他乃一极有个性之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要他一进我办公室,我就会轰他出去,因为他太能云山雾罩地高谈阔论了。在未获得他本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发表这些译文,极有可能会让他恼怒不已。

简言之,如果您文章已打好,并愿意就这样发表,请寄我一读。如果文章可发表,我们的稿酬标准一如我先前告诉您的那样,每版8到10美元。如果您想在欧洲重新发表,我们的稿酬可能稍微会降低点,不过我们这里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重发的稿子的。也请告诉我辜鸿铭的意见。

您最真诚的
欧文·葛林

四、1911/12/20

1911年12月20日,上海帝国理工学院(南洋公学)

我尊敬的詹姆斯·洛克哈特先生:

前些日子我收到了您的来信,信中说您已把回忆录译稿寄回英国发表。这样的话,我建议您在书上再加上十个汉字,即“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政府,一定会以无政府状态结束其统治。这一点在您最近所见所闻之中已经应验了。如今现实之悲剧正是如此。中国之秩序,是由那些认同道德法则的人们在维系着的。现在,倒是要感谢那些所谓的“新学”,也就是过去20余年之间从欧洲传来、由那些传教士们大力传播的有关利益与野心之宗教学说,打击了以前那种信奉荣誉和责任的宗教的“旧学”,以至于现今的文士和学生,已不再信奉遵循那种道德法则。这种状况之下,一个人沦为肉食性动物,毫无道义可言,而能够让他遵守秩序的唯一手段,就只有强力了。不幸的是,一直依靠道德法则之认同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帝国政府,却并没有强力,实在是没有。因此,正如我在那篇为皇太后辩护的文章中所预测的一样^①,这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且还没有警察。

在写给《字林西报》的那篇文章开头,我相信在士绅阶级中还是残存有道德力量的,这也可供重建对于荣誉和责任之信仰的伟大事业。但是我错了,除一小部分之外,士绅们都已经丧失了责任感和荣誉感。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新学”的传播而引起的。

李提摩太牧师(Timothy Richard)出版了他翻译的马肯西(Mac Kenzie)所著《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之后,已故的法哈博士(Faher)给我寄了一本。在致法哈博士的回信中,我曾问他是否知道,因为那断章取义并不成熟的自由、革命等思想,最终会有多少人为此而

^① 这篇文章应该指的是《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于皇太后本人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

付出代价流血牺牲。现在,流血牺牲与复仇冲动纠结在一道,而那些制造流血事件的煽动者们对此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可是,倘若反观问题现实的一面,鉴于你们西方人帮助毁坏了中国政府维持秩序所依赖之道德藩篱,你们也就应该担起相关责任,帮助重建政府和社会秩序,如果还需要借助强力的话。目前,可悲之处在于,你们外国人对于真实状况知之甚少,而且仅仅靠你们自身,可能会把局势弄得更加糟糕。如今可说是进退两难。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帝国将陷入到无政府状态;可是,如果你们施以援手,你们却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指引,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摆脱这种进退两难境地的唯一办法,就是得到更多的提示。可是,你们在这里的当局者骄傲自大,自以为根本不需要什么提示。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我和如今的总领事傅磊斯先生(H. Fraser)在汉口共事,一道努力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他清楚我的态度始终如一,而且我们对汉口的局势也甚为了解。既然有像他这样曾经很了解我的人,按常理他就应该来找我咨询,给他们一些建议。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我向报社提出,可以帮助成立一个观察委员会,傅磊斯先生和上海的外国人对于我的提议却置若罔闻。

我知道您不同意我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您必须明白,帮助那些当权者更清楚地认清局势,已是我履行自己职责的唯一可做之事。在履行上述职责之时,我宁愿听任那些“新学”暴徒们的处置。学校的学生们第一次闹学潮,鼓噪起来把我逐出了校园。住所贴满了要驱逐打倒我的布告。我不得不离开住所,与我的家人一起到法租界避难。于是学生们试图烧掉我的房子、家具和书籍,万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得逞。

老天眷顾,我遇到了一位奥地利绅士,他将自己肥皂厂里工人的住所提供给我。我算是在此找到了落脚之处,并一直在此生活着。

我曾见过和平特使唐绍仪,可以跟您说说目前的局势,但这只有等另外机会了。我认为和平会谈不会取得什么结果。恢复和平的唯一之道,就是第三方的介入,我起初并不赞同这一点。但是,介入调停必须要有个比贵当局更高明的人,否则必将导致上海的内乱。在上海,有一支人数上万的“新学”暴徒,他们全副武装,称为革命军。

先就写到这吧。我还想多说一句的是,我有可能与唐绍仪一道去北京。如果那样的话,我想把家眷送到威海卫,得到您的庇护。

最衷心的祝愿,您诚挚的

辜鸿铭

五、1912/03/01

1912年3月1日,上海

尊敬的詹姆斯·洛克哈特先生:

我从写给一位德国朋友的信中摘抄部分给您。看了这些,您就会了解这儿的局势有多糟糕。

我觉得到了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否则将会有更严重可怕的暴乱发生。而中国人所遭受的饥饿和苦难,要比暴乱更糟糕。您能否将这儿的紧急局势转告您在英国所熟悉的有影响的人物?

如果能做到这些,您所做的将是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援助。

辜鸿铭

另：正如1900年宴纳乐爵士^①阁下曾给老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制造了一点混乱一样。现如今，朱尔典^②爵士阁下正在制造一起更加糟糕的混乱。

六、1912/04/27

1912年4月27日，北京奥地利公使馆

尊敬的詹姆斯·洛克哈特先生：

就在离开上海之前，我接到了您的充满善意的来信。我来这里，是因为得到了奥地利驻华公使罗士恒^③博士的慷慨相助，他答应帮我解决生计问题。我来此已有月余，但问题尚未解决。不过罗士恒博士让我耐心等一等。同时，我也告诉这里的一位公使，他们应该让那些共和派自作自受。但是，如果外国人要借钱给袁世凯和唐绍仪，并以我们子孙后代的名义来花费这笔钱，请注意，我们是不会去偿还这笔钱的。说实在话，贵国驻华当局提供给我们的帮助确实微不足道。最终，真正的中国人民将不得不奋起，担负起保卫古老悠久中国之使命，以免它遭到我的那些共和派同胞们的蹂躏。

据我所知，这里的各国驻华公使们，并不相信一位有影响者向我描述的当下中国政府当局之“无能、腐败和挥霍成性”。所以，那些外国银行在得到他们各国公使的允许之后，大量贷款给这个腐败政府以示支持，最终将导致无穷后患。

逃离上海革命党人的喧嚣骚动之时，我的大量手稿遗失了，其中包括我的《大学》译稿。能否麻烦您把我寄给您的那本再印一份并尽快寄给我？罗士恒博士很想读读这本书。

这里先行致谢了。

您最诚挚的

辜鸿铭

七、1916/07/14

1916年7月14日，北京

尊敬的詹姆斯·洛克哈特先生：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原因在于，无论是关于我自己还是有关世界大事，我都没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您。所以我决定在私人通信中也就什么都不说了。

随信寄给您我的朋友们送给我的一份寿辞。这些朋友大多是原来武昌督府衙门的同僚，他们是来庆贺我的六十岁生日的。寿辞是一位老派学者撰写的，这也是我的同胞撰写的第一篇赞扬我的公开言论。当然在这样一个日子，寿辞也就不免有许多溢美之词。由于寿辞出自一位老派学者之手，在当下这个现代又年轻的中国，自然也就不会引人瞩目。但对也曾在中国接受过老派教育的人譬如您来说，我想寿辞多少还是会有点意思的。或许您能屈尊将其翻译一下，并刊发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之上？

无限怀念您的

辜鸿铭

① Sir Claude Mac Donald, 1852-1915, 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华大使。

② 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 英国外交官，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

③ Arthur Eldervon Rosthorn, 1862-1945, 奥地利驻华公使。

附录：《辜鸿铭先生六十寿序》汪凤瀛 撰 岁次丙辰五月

自来瑰奇特出之士，试以一名一物之征，或非其所措意；责以一手一足之烈，亦非其所擅长。时出其议论，若以惊世而骇俗，庸庸醉饱之徒，群相指目，以为迂怪。甚或回面却步而不敢一近其人。然而其人之得于天者至厚，泽于学者至深，其气至刚，其识至远，往往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任人之所不敢任，即穷而无所于遇而闭门著述，实足以寿名山而播寰海。此其人求诸今世不数数觐。独吾友辜君鸿铭庶几近之矣。

君自髫龄即负笈重瀛，遍历英法德诸国，先后卒业于其国之大学，卓然为欧洲文学之冠。凡各国政治宗教得失之故，与夫名物象数之蹟，旁及工程制造之事，莫不研精探讨，洞彻其始终源委而得其要领焉。学成归国，惧貽夫数典忘祖之讥，益动其好古敏求之念。于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深思力索，务求其义之所归；博考旁稽，必识其事之所系；于历代朝章国故，靡不讨论研究而知其兴衰治乱之由。于群经之大义微言，尤能融会贯通，而不涉破碎支离之病。佗若诸子百家，以及稗官野乘、道经释典之类，罔弗博涉多通，而尤于名儒语录、先正格言，深嗜笃好，以为率循之准。盖君之矻矻孳孳、手不释卷者历数十年如一日。宜其学日以进，而识趣日以纯也。

吾国自前清同治中年，政府始有选派生徒出洋游学之举。至光绪季年，而其风极盛，卒业而归者，就中不乏通才硕彦知名于时，而求其持正不阿，不为利禄所诱，则皆视君有愧色焉。君雅为前清南皮相国张文襄公所礼重。文襄督粤时即延君入幕，洎文襄移督两楚，引君与俱。但凡外交之事，资君赞画者居多。

不佞于庚子年始参文襄幕，获交于君。时幕佐凡数十人，以君坦白率真，咸乐其平易。及谈时事，则群疑其迂，远阔于事情格格不相入。每相聚，谐谑而已，未曾有一语及政治也。独与不佞语，若针芥之相投。而不佞亦心折君，以君之识议或不无偏激，而其心，则纯乎爱国，其志，则急于匡时，不可以世俗之见求之者也。不佞尝见时髦新进粗涉西学者矣，其于欧美诸国之政教风俗，非真能深览远识以穷其究竟也；其于吾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与其典章、文物、纪纲、法度、圣作、明述之精义，亦未尝讲明而切究之也。徒震于彼国一时富强之迹则欣羡慕悦，以为治今中国，非尽弃其旧而新是谋，殆不可以复振，而不知袭其形似失其精神，初不足以救败，而适足以促亡。光绪季年，朝廷怵于积弱之召侮，亦遂采用西制，厉引新法。而藩篱既决，奸弊滋生。不四五年，卒以颠覆，未始非新学说阶之厉矣。君于其时，每见一旧制之变更，一新制之建设，辄就余抵掌倾谈，痛论其失。余亦深有味乎其言，而服其所见之大，所持之正，于中西法制之短长，实能洞彻其本源，而初非苟为异同之说，然以语他人，则皆掉首扞舌，惊为河汉，而无极愷，亦东坡所谓不合时宜者耶。君于庚子各国联军入京之际，尝著《尊王篇》，盛称孝钦皇后中兴与致治之德以告外人。厥后议和，各国但请惩祸首诸大臣，而不复深求者，君之文与有力焉。近年复著《春秋大义》说，流布东西洋，争相诵传，相顾动色，其言之足以感人如此。君于光绪三十年以特荐外务部员外郎，会办上海浚浦局事，曾揭发承办工程荷兰公司偷冒之弊于南洋大臣。当事者意主调停，君持之坚。驻沪各国领事莫能相难，卒正其罚。又尝于三十三年上万言书于朝，指陈时政，推本于任用非人之故，侃侃无所畏避。虽言不获用于一时，直声大振，朝贵咸侧目焉。君之抱道不苟、守正不阿，皆此类也。君又欲以孔子之道推行西国，因以英文翻译《论语》、《学》、《庸》诸篇，遍布海外。各国之学者，几于家置一篇，人手一册，虽在妇孺，莫不知中国有辜君。则君之志虽不伸于中国，而吾道精微，得渐于泰